

影响

W E N H U A

中国文化的

20
大圣贤豪杰

◎……孙洪涛 [主编]



河北大学出版社



影响中国文化的

20大圣贤豪杰

孙洪涛 主编

河北大学出版社

2001/22

责任编辑:邹 卫

封面设计:张志伟

责任校对:刘景坤

责任印制:蔡进建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影响中国文化的 20 大圣贤豪杰/孙洪涛主编. - 保定:
河北大学出版社, 1999. 3

ISBN 7-81028-505-X

I. 影… II. 孙… III. 历史人物-人物研究-中国 IV. K
820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1999)第 00625 号

出版:河北大学出版社(保定市合作路 1 号)

经销:全国新华书店

印制:河北新华印刷一厂

规格:1/32(850mm×1168mm)

印张:15 字数:350 千字

印数:1~6000 册

版次:1999 年 3 月第 1 版

印次:1999 年 3 月第 1 次

定价:18.00 元

2189/12

目 录

- 孙中山 (1866—1925)
1 我的回忆
- 吴玉章 (1878—1966)
13 吴玉章自传
- 徐特立 (1877—1968)
33 我的生活
- 陈独秀 (1880—1942)
44 实庵自传
- 谢觉哉 (1883—1971)
58 六十自讼
- 林伯渠 (1886—1960)
63 林伯渠自传
- 董必武 (1886—1975)
71 自 述
- 朱 德 (1886—1976)
84 与尼姆·韦尔斯谈个人经历
- 李大钊 (1889—1927)
92 狱中自述
- 刘伯承 (1892—1986)
98 纪念杨闇公同志
- 毛泽东 (1893—1976)
103 一个共产党员的经历

- 宋庆龄 (1893—1981)
151 我和孙中山先生的关系
- 贺 龙 (1896—1969)
156 回忆红二方面军
- 王若飞 (1896—1946)
169 王若飞自传
- 叶 挺 (1896—1946)
174 囚 语
- 李维汉 (1896—1984)
181 回忆长征
- 邓子恢 (1896—1972)
192 我的早期革命活动
- 叶剑英 (1897—1986)
203 长征的艰险历程
- 周恩来 (1898—1976)
209 同李勃曼谈个人经历
- 张鼎丞 (1898—1981)
218 张鼎丞自传
- 彭德怀 (1898—1974)
226 往事回忆
- 罗章龙 (1898—)
252 椿园载记
- 瞿秋白 (1899—1935)
263 多余的话
- 方志敏 (1899—1935)
288 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
- 李立三 (1899—1967)
296 早期革命活动的几个片断

-
- 聂荣臻 (1899—1992)
309 青少年时期
- 徐海东 (1900—1970)
318 生平自述
- 蔡 畅 (1900—1990)
343 回忆新民学会会员的活动
- 张闻天 (1900—1976)
350 从福建事变到遵义会议
- 杨之华 (1900—1973)
355 熔 炉
- 陈 毅 (1901—1972)
369 和儿子的四次谈话
- 徐向前 (1901—1990)
390 革命生涯的起点
- 黄克诚 (1902—1986)
410 参加湘南暴动
- 肖劲光 (1903—1989)
431 赴苏学习
- 陈 赓 (1903—1961)
445 我的自传
- 邓小平 (1904—1997)
453 谈个人的经历
- 邓颖超 (1904—1992)
455 一次遇险与脱险的经过
- 陆定一 (1906—1996)
459 关于唐义贞烈士的回忆

王树声 (1905—1974)

471 自 传

博 古 (1907—1946)

480 与斯诺谈个人经历

杨尚昆 (1907—)

483 我的早期革命引路人

廖承志 (1908—1983)

489 忆青少年时代

王 震 (1908—1993)

497 自 述

薄一波 (1908—)

516 在北平草岚子监狱中的斗争

康克清 (1911—1993)

533 从童养媳到红军战士



孙中山 (1866—1925)，名文，字逸仙。

广东香山（今中山）人。伟大的民主主义革命家。早年以行医为职业。组织兴中会，提出三民主义学说。多次组织反清武装起义。1911年武昌起义后，被选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，不久被迫辞职。1914年在日本组织中华革命党（后改组为中国国民党），领导反袁世凯的斗争。1917年任广州护法军政府大元帅，非常大总统等职。1924年领导改组国民党，实行联俄、联共、扶助工农三大政策。1925年3月12日病逝于北京。

我的回忆

——与伦敦《滨海杂志》记者的谈话

（1911年11月中旬）

到1885年我18岁时为止，我一直过着像我那个社会阶层一般中国青年所过的那种生活。不同的只是，由于我父亲皈依基督教并任职于伦敦布道会，我有较多的机会和广州的英美传教士接触。有一位英国女士对我发生兴趣，我终于学会了讲英语。英美布道会的嘉约翰（Kerr）博士为我找到一份工作，并且让我学到了很多医学知识。我很喜欢这门学科，相信我将会有一个为我的同胞行医的有益的职业。当我一听到香港要开办一所医学院的消息，就立刻去见教务长康德黎博士，并且注册入学。

我在那里渡过一生中欢乐的五年。1892年，我得到了一张准

许以内外科医生行医的文凭。我多方设法寻找一个可以开业的地点，最后，决定到珠江口的葡萄牙殖民地澳门去碰碰运气。直到这个时候，还不能说我对政治有过什么特殊的兴趣。但是，正当我在澳门为开业而奋斗，而我的奋斗又由于葡萄牙医生的歧视而四处碰壁的时候，一天晚上，有一个岁数和我差不多的年轻商人来访，问我是否听到北京传来的消息，说日本人就要打进来了。我说我只听英国人谈过，并不很清楚。我又说：“我们都被蒙在鼓里，太遗憾了。皇帝应该对人民有点信任才行。”

“天命无常。”我的朋友说。

“对，”我表示同意，并且引述一句帝舜的话：“天听自我民听。”

那一晚我加入了少年中国党（Young China Party）。全世界现在都已知道困扰中国如此之久的弊端所在。但是，使我们受苦的主要祸根是愚昧。不让我们知道发生的任何情况，更不必说参加政府了。对我来说，由于经常和欧洲人交往，尝过他们那种自由的滋味，对这种状况就更加难以忍受。这时，我在澳门为谋求开业生涯而作出种种努力之后，不得不取下招牌，迁到了广州。接着是 1894 年中国败在日本手下，蒙受了奇耻大辱。我在广州建立一个哥老会的分支组织，并投身于会务工作。很快就有一批申请入会的徒众集合在我的周围。一天，有一名官员来找我，对我说：

“孙，你是个受注意的人物啦。”

“怎么？”我问。

“你的名声传到北京去了。还是小心点好。”

后来只因发生一个情况，才使我转危为安。传来的消息说，光绪皇帝已从梦中醒悟，不顾慈禧太后态度如何，有心赞助我们的革新。我立即草拟了一份请愿书，征集到数以百计的签名后，把它呈送到北京。

有一段时间，请愿书的命运和我们自身全部祸福未卜。随后

发生了一件事，使朝廷把注意力集中到我们身上来。那就是，为进行对日战争而募集的广州兵勇被遣散了，他们并没有重操旧业，却跑来和我们一起。此外，在广州的一帮巡勇中还出现了骚动不安，他们由于领不到薪饷而开始在市区劫掠财物。居民为此举行了一个群众大会，公推五百多人作为代表，前往巡抚衙门提出申诉。

“这是造反！”巡抚吼叫着，并立即下令逮捕为首分子。我逃脱了。这是我第一次脱逃，后来我又有多次类似的险遇。逃过了当局的毒手以后，我就急着去营救那些运气比我差的伙伴。我们拟订了一项大胆的计划，实行的时机似乎已经成熟。简单说来，就是要攻占广州城，并且坚持到我们的请愿被接纳，我们的冤情得到昭雪，新征的捐税被取消掉。而要做到这一点，就必须得到一大批汕头地方士兵的帮助，他们也是对现状不满的。我们的革新委员会（Reformcommittee）天天开会，并积聚了大批武器弹药，其中包括有炸药。一切都准备好了，完全取决于汕头士兵能否越野行军 150 多哩前来和我们会合，从香港来的一支特遣队又能否及时赶到。在规定的时间，我和朋友们聚集在一所房子里，外面有成百名武装人员把守。同时派了三四十个传令人员潜赴市区各处，通知我们的朋友们务必于次日凌晨准备就绪。一切似乎都在顺利进行，却突然来了一声晴天霹雳。这是汕头方面领导人拍给我的一份电报：

“官军戒备，无法前进。”

现在该怎么办？我们所依靠的正是汕头军队。我们试着召回我们的侦察人员，又给香港发了电报。但是来不及了，一支 400 多人的特遣队已经带着十箱左轮手枪乘轮船出发。我们的同谋者惊慌了，接着就开始出现一阵混乱，大家都想在风暴到来之前逃走。我们焚毁了所有的文件，贮藏好军械弹药。我潜逃到珠江三角洲

海盗经常出没的河网地区，躲藏了几昼夜，终于登上一艘熟人的小汽艇。刚一抵达澳门，我就荣幸地看到了一份悬赏一万两银子通缉孙汶（即本人）的告示，而且听人说，一股巡勇截获那艘香港轮船，并立即逮捕了船上所有的人。1895 年广州之役就这样结束了。

我在澳门只停留几个小时，在那里碰到了我的老相识，他对我说：“怎么，孙，你现在真干起来了。”

我答道：“不错，我已开始在干。你该记得你曾说过——‘天命无常’。”

在香港，我的安全并不更有保障。听从康德黎博士的建议，我去请教一位律师达尼思先生。他告诉我，最有效的安全措施是马上远走高飞。

“北京的臂膀虽然弱，但仍然是长的，”他说。“不论你走到世界哪个角落，都必须留心总理衙门的耳目。”

幸亏我有朋友们的资助。我必须在此提及这些朋友们的坚定和忠诚，他们衷诚祝愿我多年来努力倡导的伟大事业能获得成功。他们从不曾使我失望。幸亏我除了旅行所需外，别无奢求。我常常一连好几个星期只靠少量水泡饭过日子，也作过好几百哩的徒步旅行。但有的时候，却有一大笔盛情难却的捐款交给我随意支配，因为在美国，有些侨胞很富裕、慷慨而且爱国。

我从香港逃到神户以后，采取了一个重大步骤，把我从小蓄留的辫子剪掉了。有好几天不刮脸，在上嘴唇顶边留起了胡髭。随后又到服装店买了一身新式的日本和服。当我穿戴好了，往镜里一照，只见面目全变，不禁吃了一惊，但也为此而感到放心。我得天独厚，比大多数中国人的肤色黑一些，这是我的母亲遗传给我的特征，因为我父亲更接近于常见的类型。有人说我有马来血统，也有人说我出生在火奴鲁鲁，这两种说法都不确实。就我所

知，我是纯粹的中国人。但在中日甲午战后，日本人开始比以往更加受人尊重，而我只要留起头发和胡髭，就会轻易地被当作是日本人。我得承认，这种情况使我受惠不浅，不然的话，在许多危险关头我是难以逃脱的。即使是日本人，也常常把我看成是他们的同胞。有一次，正当我在一处公共场所被钉上梢时，有两个横滨人走过来和我说话，遗憾的是我连一句日语也不懂，但我在好几分钟中装出一副懂得日语的样子，以便把跟踪的密探摆脱掉。

离开日本以后，我在火奴鲁鲁渡过了六个月。在那里，我也有过类似的经历。那里的侨胞很多，他们都张开双臂欢迎我。他们知道我的所有事迹，也知道清政府正悬重赏购求那个臭名昭著的“孙汶”的首级。在火奴鲁鲁时，我每天访客盈门，并且收到我的朋友们、革新党(Reform Party)党员及哥老会的信函和报告。随后我到了旧金山，并在美国各地进行一种凯旋式的旅行，间或听到消息说，驻华盛顿的中国公使正千方百计地要绑架我，将我解回中国。我深知，回国后将会有怎样的命运落到我的身上：首先他们将用老虎钳把我的踝骨夹紧，再用铁锤敲碎；接着是割掉我的眼皮；最后把我剁成碎块，使任何人都无法认出我的尸体。中国的旧刑律，对政治煽动者是从不心慈手软的。

1896年9月，我渡海赴英国。次月11日，在中国使臣的指使下，我在伦敦波德兰区的中国公使馆被绑架。那次绑架事件已为举世所知，这里只须简单说几句就够了。我在严密的监视下被关在一个房间里达12天之久，就等着把我当作精神病患者用船运回中国。如果我的良师益友康德黎博士当时不在伦敦，我是根本不可能脱险的。经过多次失败的尝试，我设法让他知道了我的情况。他把这一消息通知各家报纸，警方和沙利斯堡勋爵终于在最后时刻出面干预，并且下令将我释放。

我在伦敦和巴黎作了一段时间的游历和研究之后，觉得该是

回国的的时候了。我认为，我的国家正需要我。当我回到国内，发现一切都处于扰攘不安的状态。现在全世界都已知道义和团所引起的乱子。在那段可怖的日子里，我经常发表谈话、写文章和演讲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坚信，没有任何东西能够阻挡这一场不可避免的革命。我每天提心吊胆地过日子，因为有一些极端分子开始与我为敌，这些人憎恨欧洲人和欧洲文明，一心要把“洋鬼子”赶出中国。

那时我又碰到另外一件重要的事情。有一次，我正向一群追随我的同伴演说，看到了一个身材瘦小的年青人，他身高不够五呎，年龄和我相仿，脸色苍白，显得体格纤弱。事后他来找我，对我说：

“我愿意和你共同奋斗，我愿意帮助你。我相信你的宣传一定能够成功。”

从他的口音，我听出他是个美国人。他伸出手来，我紧紧握着向他道谢。但不知道他到底是什么样的人，我猜想他也许是个传教士或学者。我没有猜错。在他走后，我问一位朋友：

“那驼背的小个子是谁？”

“噢，”他说：“那是咸马里上校，当今世界上出色的军事天才之一——不，也许就是最出色的一个。他精通现代战争的战略战术。”

我吃惊得几乎合不拢嘴。

“正是他刚刚表示愿意和我共同奋斗。”

第二天早晨，我拜访了咸马里，现在他是将军，而且是《无知之勇》一书的著名作者。我告诉他，一旦我的革命获得成功，而我的同胞又授权于我，我将聘请他为首席军事顾问。

“不必等到你当上中国总统，”他说。“在那以前你就会需要我。没有军队，你既不可能建立也无法维持一个政权。我确信，中国

人经过适当的训练就可以组成出色的军队。”

大多数经过欧式战术训练的新军，都是爱国而有志于革新，但在他们占领汉阳军火库之前，他们不会有弹药。因为发给他们的，向来都是些没有弹头和未经装药的空弹壳。

有些朋友经常为我的安全担心。而我本人，也许由于中国的宿命论还残留在我心上的原故，却把这类问题置之度外。我的死期临近时，总是要到来的。一天凌晨，当时我正在“南京”轮船上，一个人走进我的舱房。

“孙，”他说，“我是一个穷人，我有妻子儿女。”

“我明白了。你的意思是，有人出100块大洋让你出卖我？”

“还要多些，”他说。

“那么，1000？”

“5000，孙。你只是一个人，孙，而慈禧可以要许多人的命。她恨你，她决心要砍掉你的脑袋，那时候你的头对任何人都不会有什么好处。如果你现在把它给我，就可以使我们全家富裕和幸福。”

“的确如此，”我说。“我的头对于我一文不值，但是，他对于你难道就很值钱吗？因为如果你把我出卖了，官员们不仅会从你那里把那笔钱统统夺走，而且你的孩子、还有别家的孩子会继续穷困下去，千百年如此，永远没有尽头。金（Jin），听着，我现在是你的了。我的头就是你的头。你愿意拿你自己的头去换5000大洋吗？‘天命无常’。只管去报告你的主子，我就在这船上，决不会走开。”

他跪倒在我的脚下，求我宽恕。但是第二天我听说那人投水自尽了，心里非常难过。因为他说过，他为他有过想要把我出卖给敌人的可耻念头，而感到无地自容。

我能够讲出许多有关悬赏我的首级的故事。说来令人感慨，在

所有谋算我的人们中间，竟再没有人像上面所说的那一位。有些人千方百计想要得到这笔赏金，但总是我的朋友们救了我。有一次，我被藏在一间屋子里，有六个星期不曾离开房门一步。又有一次，我在广州郊区的一间小屋里和一个渔民住在一起，人家告诉我，有两名士兵奉命埋伏在附近的小树林里，只要一看见我就开枪射击。他们要我小心，让我在小屋里躲了两天。后来，听说那两个士兵自己被打死了。

但是我最不寻常的经历，也许要算在广州有两名年青官吏亲自来捕捉我的那一次。在一个夜晚，我只穿一件衬衣，在屋子里阅读文件。那两人推门进来，让带来的十几名士兵留在外边。当我见到他们时，就镇定地拿起一本经书，高声朗读起来。他们静听片刻，其中一人便开口问我一个问题，我回答后，他们又问了些别的。接着是一场长时间的争论，我将我的观点以及成千上万想法与我相同的人们的观点，不厌其烦地加以阐明。两小时以后，那两人走了。我听得他们在街上说：“这不是我们所要抓的人。他是一个好人，致力于行医。”

据我估计，索购我的首级的赏格曾提高到 70 万两（即 10 万英镑）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有人问我为什么竟然在伦敦随意走动而不加戒备。我的回答是，我的生命现已无足轻重，因为已经有许多人可以接替我的位置。十年前，如果我被暗杀，或者被解回中国处决，事业就会遭到危害。但现在，我付出多年努力所缔造的组织已经很完善了。

拳乱结束时，我回到美国。当时我急需一种比军队和武器更为重要的东西，没有它，这两者都不会有，那就是钱。不是指我曾从各处得到的只那么多的款项，而是至少要有 50 万英镑。没有这么多的钱，就会失败。于是我开始扮演一个新角色，即政治基金的募集人。我为此到过美国各埠，并访问了欧洲所有的第一流

银行家。我又派遣代表前往世界各地。而有些人声称为我活动，其实是以我的名义行骗。我不愿多谈这些，尽管有一个人已被大家指责为革命的叛徒，因为他侵吞了一笔付托给他保管的巨款。他将自食其果。

全世界尤其在美国，盛传中国人自私而唯利是图，这对于一个民族是莫大的侮辱。有许多人，将他们的全部财产交给我。费城的一个洗衣工人，在一次集会后来到我住的旅馆，塞给我一个麻袋，一声没吭就走了，袋里装着他 20 年的全部积蓄。

当时，我密切注视着中国，以及国内发生的各种事件。慈禧太后死去，我意识到，命运之神是在做有利于袁世凯的事情。不久，他将成为我们国家命运的主宰。不过我也知道，要是没有我，他将一事无成。

欧洲人认为，中国人不愿意与外国人往来，只有刺刀尖才能迫使中国港口向外商开放。这是完全错误的。历史已用许多事实证明，在满洲人入主中国之前，中国人曾和邻国保有密切的关系，还表明他们并不厌恶外国商人和传教士。外国商人可以在全国各地自由游历。在明代，排外意识是不存在的。

满洲人到来以后，改变了传统的宽容政策。闭关锁国，不与外人通商。驱逐传教士，杀戮中国教民。禁止中国人移居海外，违者处死。这是什么缘故呢？只不过因为满洲人立意要排斥外国人，希望中国人民憎恨他们，以免因受外国人的启迪而唤醒了民族的意识。由满洲人所培植起来的排外精神，在 1900 年的拳乱中达到了高峰。谁又是那次运动的首领呢？不是别人，正是皇室中的成员。在中国游历的外国人常常说，人民对待他们，比之官吏要更为友善。

一个新的、开明而进步的政府必定要取代旧政府。当这一目标实现以后，中国将不仅能使自己摆脱困境，而且还有可能解救

其他国家，维护其独立和领土完整。在中国人中间，有高度文化素养的大不乏人，我们相信，他们必能承担组织一个新政府的重任，为了把旧的中国君主政体改变为共和政体，思虑精到的计划早已制订出来了。

人民群众已经为迎接一个新型政权作好准备。他们希望改变政治和社会处境，以摆脱目前普遍存在的可悲的生活状况。国家正处于紧张状态，恰似一座干燥树木的丛林，只需星星之火，就能使它燃烧起来。人民已为驱除鞑虏作好准备，一旦革命势力在华南取得立足点，他们就会闻风响应。北京附近的七个镇，是袁世凯所一手建立的。由于他的被贬黜，这些军队效忠北京政府的坚定性已经大大削弱。

我要在这里再次列举 260 年来鞑虏统治期间，我们所身受的主要虐政：

- 一、满洲人的统治是为其本族的私利，而不是为了全体国民。
 - 二、他们反对我们在智力方面和物质方面的进步。
 - 三、他们把我们作为被统治民族对待，否认我们各种平等的权利和特权。
 - 四、他们侵犯我们不可让与的生存权、自由权和财产权。
 - 五、他们纵容和鼓励贪污行贿。
 - 六、他们压制言论自由。
 - 七、他们未经我们的同意，不公平地向我们征收重税。
 - 八、他们实行最野蛮的酷刑。
 - 九、他们不经法律而剥夺我们的各种权利。
 - 十、他们不能履行职责，以保障其辖区内居民的生命和财产。
- 虽然我们有理由憎恨满洲人，我们仍试图与他们和好相安，但却是徒劳的。因此，我们中国人民已经下定决心，尽可能采取和平措施，必要时诉诸暴力，以争取公平的待遇，并奠定远东和世